

「保守」與「保守主義」

●王紹光

王紹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國際政治學系
教授

何謂保守

如果討論同一社會現象時，兩位觀察者得出絕然相反的結論，大概只有兩種可能性能解釋這種差別：要麼是他們立場不一樣，觀察角度的不同造成「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效果；要麼是他們所用的概念不一樣，分析工具的不一致導致辯論雙方各說各話，交不上鋒。有人說，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論辯常常是由於概念不清造成的。依我看，這正是余英時、姜義華兩教授有關激進與保守辯論的癥結所在。

新聞報道和日常用語中，「保守」一詞的用法是極其混淆的。就人物而言，康有為、劉師培、胡適、錢端升、蔣介石、陳雲、李鵬、列根、利加喬夫、布坎南都曾被人斥為「保守」。他們顯然並非一類。就政黨而言，英國的保守黨、日本的自民黨、台灣的國民黨、美國的共和黨、大陸的共產黨常被人稱為「保守」。它們顯然也並非一類。目前在中國大陸和俄國，反對市場化、私有制的政治勢力被叫作「保守派」；但在捷克，鼓吹一夜之間變成資本主義的政黨卻自稱

「保守主義者」。很明顯，用來作為政治標籤的「保守」、「保守派」、「保守主義」這類概念是不能用來作為分析工具的。

嚴格地說，保守是人們對如何改變自己所處狀態的一種態度。這裏所說的狀態可以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形態，甚至可以包括髮型、服飾、飲食習慣（例如王蒙所謂「堅硬的稀粥」）等。應當強調的是保守不是對他人所處狀態的態度，而只是對自己所處狀態的態度。世界上不乏這樣一種人，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狀態採取十分謹慎保守的態度，而對別人所處的狀態則指手劃腳，顯得激進得不得了。用中國俗話說這種人叫作「坐着說話不腰疼」。更具體地說，我們可以從上面這個定義推出下面五個斷言：

(1) 保守不是對傳統的態度。

如果傳統是某種久已失落的東西，恢復傳統是不可能的。要「恢復」傳統，就要打破現存的秩序，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情況下誓言「吾從周」；康有為在辛亥前「托古改制」都是因為

很明顯，用來作為政治標籤的「保守」、「保守派」、「保守主義」這類概念是不能用來作為分析工具的。保守是人們對如何改變自己所處狀態的一種態度。

不滿現狀。在效果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大概與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教原教旨派運動很相似，與其稱之為「保守」，不如稱之為「革命」。

(2) 保守不是對終極目標的態度。

封建社會有其保守分子，資本主義社會有其保守分子，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其保守分子，判斷某人、某黨、某派保守與否因此與其追求的終極目標無關。

(3) 保守不是對現狀的態度。

在日常用語中，「保守」常常被當作「守舊」、「死板」、「反動」、「維護舊秩序」、「僵化」、「一成不變」的同義詞。但被人冠之以「保守派」的人並不一定認為自己所處的狀態完美無缺、無懈可擊。相反，他們往往也希望看到一些正面的變化。余英時先生文章中引了伯克的名言，「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的能力」。這句話說明保守分子並不一定個個抱殘守缺。

(4) 保守不是對將來走向的態度。

如果說保守分子也能接受「變則通」的道理，那麼保守分子與激進分子的區別就不是「要不要變」的問題，而是「如何變」的問題。細分起來，「如何變」仍有兩層含義：一是變化的途徑，一是變化的速度。變化的途徑有很多，保守分子並不能在何為最佳途徑上達成共識。因此對將來走向的選擇仍不能作為評判保守與否的尺度。

(5) 說到底保守是對改變現狀的變化速度的態度。

變化速度當然是個相對概念，只

有相對於葉利欽，戈爾巴喬夫才顯得保守；而相對於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就太激進了。上面列舉那些被稱為「保守」的個人和政黨，其他方面也許千差百異，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相對於本社會內的其他個人和政黨，他們主張緩進。

但並不是所有沾上保守邊的思想或人都可以稱之為「保守主義」或「保守主義者」。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主義」是「對宏觀世界、社會生活以及學術問題等所持有的系統的理論和主張。」在學術討論中，我們不應把「保守傾向」、「保守思潮」、「保守行為」與「保守主義」混為一談。保守傾向是個人層面對漸進的偏好。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有相當多的人有類似的偏好，則可稱之為保守思潮了。保守思潮是群體現象，但常有知識精英作為其代言人。然而，保守思潮的形成並不賴於其代言人的理論精細與否。一般說來，當社會中大多數人對現狀十分滿意時，激進思潮是沒有甚麼市場的。如果情況不好不壞，人們又看不到有甚麼別的更好的選擇，激進思潮也難成氣候。只有當情況對大多數人而言已不堪忍受，任何選擇看起來都好於現狀時，激進思潮才會佔上風。激進思潮崛起之日就是保守思潮式微之時；反之亦然。

保守思潮在社會各集團中的分佈往往十分不平衡。如果一社會集團在可能的變局中失去的只是鎖鍊，則很難指望它會成為保守思潮的堡壘。在可能的變局會有得有失的社會集團則往往立場模糊。正是在社會的統治集團中，保守思潮有其最堅強的支持者。當然，就充當保守思潮代言人的知識精英而言，這種簡單的階級分析並不完全適用。同屬知識階層，有人

伯克的名言，「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的能力」。

為保守思潮鼓噪，有人為激進思潮吶喊，這種現象在中外思想史上屢見不鮮。

余英時教授講的主要就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中的種種思潮。由於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中面臨重重危機，激進思潮高漲應不是甚麼難以理解的現象。

有激進傾向的人，行為不一定處處激進。同理，受激進思潮影響的社會運動不一定能帶來徹底的社會變革。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大概不外下列四種，第一，自以為激進的人骨子裏不乏傳統的沉澱物；第二，歷史的慣性對廣大百姓行為的影響；第三，作為激進社會運動對立面的保守勢力太強大；第四，現實中的其他種種限制。質言之，客觀環境（人口、資源、經濟發展水平、國際列強與周邊國家的立場等）、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普通民衆的漫不經心，以及激進派自身的局限性都會削弱激進思潮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姜義華先生發現，在行為層面，過去一百多年裏，保守勢力比激進勢力更有影響。這確是很有見地的觀察。

如此說來，余英時、姜義華兩先生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甚麼矛盾。在思想層面，誠如余先生指出的，中國近百年來經歷了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但就行為後果而言，姜先生也沒說錯，激進勢力對百餘年來現實生活的實際影響是有限的。因此，我同意汪榮祖先生的推斷：「近代中國思想趨向之激進，恰與社會勢力之保守成正比。」

但嚴格說起來，余、姜二先生談的只是保守（激進）思潮和它們的行為後果，而不是保守主義。如前所述，主義者，自洽的理論系統也。在中國

近現代史中，保守思潮與保守行為固大量存在，但保守主義卻鮮見。保守派與保守主義者可能很不一樣。前者主張緩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他們要維護一個特定的秩序，後者主張緩進則是因為他們相信緩進是在任何歷史進程中都必须遵循的原則。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人，他們在某一個問題上，或某一個時期裏保守，而在另一個問題上，或另一個時期裏激進。余英時先生採取的就是這種立場，他一邊斥責共產黨太激進，一邊主張以激進的方式推翻共產黨。這大概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

真正的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有其哲學上的根據。在本體論上，它將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像所有有機體一樣，人類社會有三個特徵：第一，其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第二，因為社會的各部件一環扣一環，牽一髮可能動全身；第三，容易遭破壞，不容易改進；而且只要稍加破壞，幾乎無法復原。在認識論上，保守主義者相信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既然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是複雜的，而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邏輯的結論便是，人們至多只能預見小變的後果。如果變化幅度較大，則難以預料它的全部後果。順着這條思路，還可以導出以下兩個推論：第一、人們沒有能力設計出一個理想的未來社會，至少不可能一下拿出一幅有關未來社會的藍圖；第二、決策者不可能分清甚麼是可行的社會改造計劃，甚麼是不可行的社會改造計劃。基於這些理由，只有波

余英時、姜義華兩先生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甚麼矛盾。在思想層面，誠如余先生指出的，中國近百年來經歷了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但就行為後果而言，姜先生也沒說錯，激進勢力對百餘年來現實生活的實際影響是有限的。

余英時先生一邊斥責共產黨太激進，一邊主張以激進的方式推翻共產黨。這大概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

普所說的「漸進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才是可行的。而他所謂「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則不僅不可能成功，還會造成可怕的後果。

奧克夏特(Oakeshott)在他的《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及其他》(*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一書中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知識，一種叫作「技術性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另一種叫作「實踐性或個人性知識」(practical or personal knowledge)。據奧克夏特說，技術性知識是可以通過教學傳授的。人們可以從課本裏、在課堂上學到它。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就屬於這種知識。獲取這種知識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但實踐性知識只能在實踐中學，在課堂上是不可能學到的。毛澤東所謂「從戰爭學習戰爭」可以當作一個例子。社會變革的辦法就是實踐性的知識。它無法從前人留下的紀錄中學得。充其量，從前人留下的紀錄中只能學到負面的教訓，了解甚麼是不該做的；但前人的經驗不可能指導如何解決今天的問題，因為今天所處的環境與前人所處的環境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這樣，社會變革的過程就是一個摸索的過程(learning process)，而摸索的過程必然是個漫長的過程。在沒有現成知識的情況下僅憑願望行事，就好比在沒有指南針和地圖的情況下試圖走出一望無際的沙漠。有關社會變革的知識當然不是全然不可得，但只有在小變和慢變中才能逐漸積累這種知識。小變還是可以逆轉的，一旦發現事情不妙，還有補救的辦法。如果一上來便大刀闊斧，到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說到底，奧克夏特認為，知識論也為保守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對未來盲目樂觀是要不得的，人們需要對未來持一種健康的懷疑。希望造成不可逆轉局面的想法是要不得的，給自己給他人應該留一條能撤退的後路。

在過去一個世紀保守主義實在是既說不上太弱，也說不上太強，因為它幾乎不存在。現在既有那麼多人批評激進主義，試圖為「保守」正名，也許中國保守主義的誕生已為期不遠了。

保守主義者着眼的不是終極目標，而是眼下存在的問題，尊重現狀不是因為它與某種傳統有關，也不是因為它比任何可能的選擇都好，而是因為人們對現實比較熟悉。改造社會是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不可能只有得沒有失。社會改造也許能造成改造者希望造成的好結果，但也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壞結果。幾乎可以肯定的說，每當有人試圖改造社會，其行為產生的變化一定比他們預想的變化要來得大，而且一定會有得有失。沒人知道得是否償失。最後的得大於失是可能的，但不能排除把聾子治成瞎子的危險。因此，先破後立是要不得的，破字當頭，立字不一定就在其中。大躍進是要不得的，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才是正途。對未來盲目樂觀是要不得的，人們需要對未來持一種健康的懷疑。希望造成不可逆轉局面的想法是要不得的，給自己給他人應該留一條能撤退的後路。總之一句話，對保守主義者來說，a known good is not lightly to be surrendered for an unknown better。

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激進思潮曾大行其道，保守行為卻難以克服，這大概是余、姜二先生都能接受的判斷。但說到保守主義，它實在是既說不上太弱，也說不上太強，因為它幾乎不存在。這不知是否與「保守」一直被當作貶詞有關。現在既有那麼多人批評激進主義，試圖為「保守」正名，也許中國保守主義的誕生已為期不遠了。

王紹光 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90年獲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耶魯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